



逯耀东著

抑郁与超越

司马迁与
汉武帝时代

抑郁与超越

司马迁与
汉武帝时代

逯耀东著

Simplified Chinese Copyright © 2008 by SDX Joint Publishing Company All Rights Reserved.

本作品中文简体版权由生活·读书·新知三联书店所有。
未经许可，不得翻印。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抑郁与超越：司马迁与汉武帝时代 / 逯耀东著. —北京：
生活·读书·新知三联书店，2008.12
ISBN 978 - 7 - 108 - 03023 - 8

I. 抑… II. 逯… III. ①中国—古代史—纪传体②史记—
研究 IV. K204.2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8) 第 111989 号

责任编辑 孙晓林

封面设计 罗 洪

出版发行 生活·读书·新知 三联书店

(北京市东城区美术馆东街 22 号)

邮 编 100010

图 字 01 -2007 -4776

经 销 新华书店

印 刷 北京市松源印刷有限公司

版 次 2008 年 12 月北京第 1 版

2008 年 12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

开 本 635 毫米 × 965 毫米 1 / 16 印张 24

字 数 311 千字

印 数 0,001 - 7,000 册

定 价 38.00 元

睹书伤逝：纪念逯耀东先生

田余庆

三联书店的朋友来家叙谈，提到三联正在印制逯耀东先生《抑郁与超越——司马迁与汉武帝时代》一书。我们由此谈论到逯先生的为学与为人，随便聊天，没拘束也没目的。我与逯先生交往较久，常存怀念，多说了一些话。事后，朋友把我聊到的话追记下来，交给我看，还带来了逯著的清样，说是想把谈话收进逯著里去。这是我未曾预料的。经过一番焦心，我知道不便再作婉拒，只好把追记文字编联一下，顺了一顺，把交谈语气改成叙述语气，还给三联朋友听由处理。我说，这不是对逯著的序跋，而是对逝者的追忆，如果要放在书里，也只能当个小摆设，表示睹书伤逝之情。

我结识逯先生，已经二十多年了，是在一次学术会议中间。他是从香港来的。那天他邀约几位年辈差不太多的同行朋友晚间到外面喝酒，后来因故改聚在饭店房间里，记得有蔡美彪兄在内。房间不大，有点挤。寒暄让坐之际，逯先生忽然拿起沙发软垫扔到墙根，自己先坐下去，说声“好，都有座了”。一个不假思索的小动作，一句随便的开场白，一两秒钟的事，立刻拉拢了新朋友之间的距离，也无意中表

露了他不拘小节、豪爽豁达的性情。这个初次印象很有特点，长久留存在我的记忆之中。那时台湾还未开禁，两岸中国史学同行直接交往还不够多，所以都想了解一些情况。逯先生健谈，自然成为沟通的主角。其实他那时对大陆史界的了解也还不像以后那么深广，自然也有不少话题要提出来。他的态度始终是亲近恳切的。限于初识，那晚只是泛泛交谈，没有涉及深度的学术内容。

约会由逯先生发起，酒自然是少不了的。那晚只用了一点本地酒，是色酒，淡淡的，点缀点缀，没起助兴作用。逯先生的文章里，曾多次提到在台北下酒馆，一瓶大曲两人对酌，酣畅之极。这次我们晚叙，可没有机会体察逯先生在“名士与酒”场景下的率性表现。以后再见，我已基本忌酒，与逯先生虽同餐而不能共饮。不过，每当听刘欢高唱好汉歌，总会幻现一碗酒的场景，泛起一个风风火火闯九州的好汉形象，那不是绿林好汉，而是学林好汉，逯耀东。

说到好汉，我也只有泛泛的直观感受，与逯先生自己写的《那汉子》相比，就显得浮浅多了。《那汉子》是逯先生最真切的自我画像，是素描，是漫画。虽说写得虚虚实实，并非全真，但虚是实的升华，比实还实，只是经过他自己的艺术加工，有意把形象模糊化了。

逯先生的吃，更是有名，他写吃的，有论文，有纪行纪事之作，后者居多，读来颇有味道。有同行朋友称说逯是美食家，我看不全对。我周围所见的美食家，有的是尊显家庭的前辈人物，他们原本有养成美食的经济条件和社会环境；有的是世家子弟，从小得到这方面的陶养时代和家庭状况变了，素养犹在。他们都有美食文化的长期实践。像我自己这个年龄层次和经历的人，果腹之余，但有一张馋嘴，却不理解美食文化，养不成那种好尚。逯先生比我年岁略小，据他自己说，青壮年时生活也是比较艰难的，何从得到这种文化薰陶呢？也许这样提问题是由于我对美食文化所知太少。逯先生写过一些关于美食佳肴的文章，有谱系，有特色，有调法，甚至亲手操作，得其口

验。这当然是可以写进饮食学教科书去的好资料，只不过阳春白雪，能领略的读者可能不多。倒是 he 从街头巷尾循风问俗得来的“吃”，应当也是，甚至可以说更是真正有文化涵义的吃。譬如看画，听乐，受众得到愉悦，得到修养，但是否能够体会到作者审音辨色的真功夫，却是难说。逯先生在街头巷尾觅“吃”，认真品尝，我看不是为了饱口福，而真是在细辨土风土味，同音乐家审音、画家辨色一样。神农尝百草，逯氏品百味，意蕴有点近似。逯先生的吃，更多的是舐，舐其味而弃其余。他在辨味中思考知识。他的味蕾大概特别发达，吃得出知识来。“绘事以众色成文，蜜蜂以兼採为味”，逯先生兼採成味，一定会以这种知识充实他的中国饮食史，说不定这类美味知识比烹调知识有同样的甚至更可贵的价值。总之，逯先生的吃，主要不是馋嘴的吃，吃得另有门道。我猜如此，对不对不知道。

说到这里，不由得不想起逯夫人李戎子。有这样一幅画面：一个汉子蹲在街边，只顾用筷子向嘴里送东西，神情专注。卖食的摊主问那汉子还想要点什么，那汉子站起来说，这碗剩下的，不要了，那边那种，给我来一碟。汉子身旁跟着李戎子，一直没动，一脸的无可奈何，只是提醒那汉子，尝尝味就够了，把嘴里的吐掉。她还打开手提包，看看治泻药带够了没有。这是一幅读逯文时构想的画，如果还能传神，可当作逯文配图来看。

戎子夫人，我见过，在北京我家，得知她原本是岳阳人，那里是我小时居处的邻县，方言、土俗、河山，我都知道一点。她说她们考虑到岳阳置产，想以后常来住住。后来变了主意，另有安排。我读过逯兄伉俪偕访岳阳的文章，内容一般，大概是岳阳的吸引力并不足够。我也去过台北兴隆路他们家里，那次只有逯先生“留守”，戎子去加拿大了。想来戎子要照顾一个生来任性执着、喜爱闯荡的汉子，不是容易的事，够她费心费力的。逯先生在他的书序里说，戎子是他学术写作最好的听众和助手，帮他誊抄，制表，校正古籍引文和操作电

脑。我还知道戎子工于篆刻，《结网编》封面印章和诸书所钤“糊涂斋史学论稿”等刻，都出于戎子之手。如今戎子夫人独处台北，孤单的日子已过了两年多了。她为人贤淑，逯先生人缘也好，想必随时都会有亲友眷顾关切。逯先生的遗著也是戎子自娱的丰富精神资源。逯氏门下亲近甚多，多在台北近处，他们都是戎子夫人随时可以呼应的子弟。

逯兄教导学生的方法高明，不主张他们死守一家，而是各自“结网”。两部《结网编》所列篇目，显示各有所专，范围较广，不是泛泛之作。这与大陆近年所见，弟子一般只是跟着导师做题目，怯于独辟蹊径，少见新题新意，是有所不同的。逯兄对学生有时也很严厉。我亲见他责备一名学生，这自然易伤面子。但他们亲如家人，没有听说影响长远的感情。

逯门弟子我见过一些。他们来大陆访学时逯兄有时介绍与我晤谈。最后见过的一位是陈识仁君，是逯门新进。我与识仁君有过一点学术因缘。我写《代歌、代记和北魏国史——国史之狱的史学史考察》一文时，正好逯先生把《结网编》寄赠给我，其中有识仁君《北魏修史略论》一文，我受到一些启发，引用了此文，并特意标出“青年史家陈识仁”，以示尊重。后来王汎森先生来京，座中偶然谈及，他在台北“国科会”工作时见到识仁君一份关于学术申请的论证书，引述我对他前述文章评论之词。看来识仁君对自己的论文及时得到大陆同行的反响，是在意的，高兴的。识仁君2006年来京访学，与我晤谈逯兄近况。万万想不到，第二天一大早识仁从寓处给我电话，说半夜得台北告知，逯先生刚刚在高雄逝世，识仁自己停止在京活动，已购买立即返台的机票，马上动身。真是晴天霹雳。我想到刚从台北与逯先生餐叙后返京的葛兆光先生，商请他发出我们共署的给戎子夫人的唁电，以誌哀悼。一条汉子忽然间走了。识仁匆匆告别，我觉得他的心情极似亲子奔丧。师生关系密切到这种程度，对毕生从教的逯兄说

来，应该足可慰藉。这样的学生，对戎子夫人也自然会敬奉如母。

前面拉杂叙谈，已经涉及许多逯先生为学的事了。逯先生为学，文史均长，但主要成就还是表现在史学著作里面。我们认识以后，每有新作，几乎都会互赠，只是他多我少，他丰我瘠，他博我馁。他的史学研究领域，先是在魏晋的社会、民族、政治诸方面，后来由史料、名著、名家的研究逐渐进入史学史，重在秦汉魏晋。其间，他做过中国现代当代史学发展的研究，发表过著作和不少史论文字。总之，他是一位业精于勤，思想敏锐，手不释笔的学者。以国史中的魏晋南北朝来说，从大陆看，老一代的大手笔多已迈过鼎盛之年，我这一代则多长期陷身混乱而难得正常发育。这个阶段，逯先生不误青春，沉潜翰墨，展示才华，奉献学界，是大可珍贵的。

大陆同行获悉逯兄成就，已是八十年代以后的事了。逯先生留意与大陆同行学术联系，广有交游，所以他在台、港所出著作也较快流传大陆。甚至在大陆出版。眼下所见的这本《抑郁与超越——司马迁与汉武帝时代》，是他亲手辑集、尚未杀青的一部重要的史学作品，是他在其长期酝酿的史学史研究思路中，关于汉代史学的最后成果。逯先生的书，较早到手的，我都过细拜读过，深得启发之益。不过时间久了，体衰脑钝，只留隐约印象，可以说是得其意而忘其言。较晚到手的书，更是阅读困难，勉力过目，即读即忘。虽然如此，逯先生的思路文风，总还是留在我脑子里，不会丢失。

斯人逝矣，斯文长在。学林中人，不止是我，都知道糊涂斋主人是位极聪明的人，“糊涂斋”的糊涂，只能视之为使用“难得糊涂”的旧典。读糊涂斋主的书文，都会细品那种醇厚的味道，都会长久地记住学林中自成一格的这条潇洒的汉子。

二〇〇八年八月

出版说明

《抑郁与超越——司马迁与汉武帝时代》是逯耀东先生的遗著，共有正文八篇、附录三篇，为其毕生研治《史记》的心血结晶。

本书自2004年1月起，即已陆续交稿排校，书名几经斟酌、改动，方才定案。其后，先生更耗费一年半时间，仔细校阅书稿的行文、论据及引文出处，务求尽善尽美。稿样校毕，先生即着手撰写书序，题名“残灯”。岂料属稿未定，竟遽归道山，留给后人莫大的遗憾与怀念。

先生要在“残灯”中表述的深意，今已无缘得见，为了弥缝这个缺憾，故敦请先生两位弟子李广健、陈识仁为本书撰写“导言”。由于恐怕仍有遗漏，遂请先生另一弟子黄清连襄助，校阅一过。三位先生追随逯先生有年，情同父子，而且学术上各有专精，最为知晓先生思想学问。透过“导言”可使读者明了全书要旨及体系，而“残灯”手稿，则如实呈现于书前，以传达太史公撰史暨先生著书“抑郁与超越”之心境。

本局刘董事长与逯先生论交半世纪，时相与把酒谈笑，叙旧遣怀。本书之面世，亦可聊偿故人心愿矣。

东大图书公司编辑部 谨识

残灯

司马懿下值驿站，出得官东门，沿着草直后御道缓步走到他所乘驿馆，仰见殿首西望，十二月初朔已，自官林树叶落尽，漫呼啸而来，撞动了灰白天空半低沉片乌云，沿着管道之官窑流淌下来，在壁上墨迹的窗纸透映在墨色窑洞之间，不停地翻腾流动着。
征得辞行是章，曾得文津秘书莫识。

张华

司马懿深长了一口氣，脚下他向武帝墓前走来。这大半年他陪伴卓然在外，现在回到京师，但甫一仰月又直得路上赴雍，上，是司马懿人所人领对武帝的称謂，连称消除敬景外，还有此微的乾臣，自无漢二年化国李陵事件下葬，宣政，祇有留在空中，~~李陵~~身挂地下中首令后工作，在武帝身负责天官庙祀的工作，他们君臣似乎比往日更熟了。所以，出宫前向武帝震告一声，武帝正在坐殿，他悄声退出时候，珠纱帳内传出武帝微弱的声音：「是子房也？」

「是？」司马懿轻声恭恭敬答。丝弦又静了趋向武帝后寝殿里。

「早去早回？」武帝自沙发上撑起身子，司马懿急忙做向幔子曳扶持，武帝微皱眉头说：「子房，你尚查之廟宇裡都有什么東西？」

「是？」司马懿低声回答，心惊，~~这~~今天是皇帝化令天在這屋裡已经搜查了好些时了。元帝说的東西，是何物不即刻小小人上面有武帝的生辰八字，生辰八字。
去年十一月，巫蛊事紛穿空，江充奏报宮中巫蛊，列太子官擅重，王皇后御到一个小孩木人。

自此之後，武帝性格未免改變，武帝特别惊疑，左右都以为是巫蛊，段全歌多，於是司马懿快言快语，祸害陷底，仔细搜查一遍，之后，说巫蛊许得，就說好是巫蛊，才安心得下来，施之于說，「~~玄~~」司马懿欲行又走，才得別稱并封紗帳管。看见着帳內的武帝已经睡熟了，微一耽耽孔后，后說他着相瘦削脸庞，眼睛深邃，下陷，鼻頭微挺，沉没的双眸，神采奕奕，牙齿——司马懿指之是出，他欲要打抱他的右臂，且喜容，尚向老人，竟是天下权力的权力主宰者，而且对后世极有影响，和

莫不承之於余三人。

目 次

睹书伤逝：纪念逯耀东先生 _____ 田余庆 1

出版说明 _____ 1

“残灯”手稿 _____ 1

导 言：抑郁与超越 _____ 1

《太史公自序》的“拾遗补艺” _____ 35

“通古今之变”的“今”之开端 _____ 91

武帝封禅与《封禅书》 _____ 141

《匈奴列传》的次第问题 _____ 167

对匈奴问题处理的限制 _____ 207

列传与本纪的关系 _____ 235

史传论赞与“太史公曰” _____ 265

“巫蛊之祸”与司马迁绝笔 _____ 295

- 附录一** 沈刚伯先生论“变”与司马迁的“通古今之变” _____ 327
- 附录二** 汉晋间史学思想变迁的痕迹 _____ 343
- 附录三** 前不见古人 _____ 361

导言：抑郁与超越

汉武帝时代是一个空前变动的时代。

汉武帝自建元元年（前140）至后元二年（前87），在位共五十四年。自建元元年（前140）至元封元年（前110），司马谈任太史前后恰三十年。司马谈卒后，司马迁继任太史，至征和二年（前91）。《报任安书》说：“得待罪辇毂之下，二十余年矣。”武帝崩于后元二年，司马迁或也在此时前后不久弃世。

司马氏父子相继为太史，侍从武帝左右，或从巡幸天下，或侍议中廷，前后经历了整个汉武帝时代。司马氏父子因为职务的关系，久处于政治权力结构中心之内，他们虽然不是决策者，却亲历每一个重大的历史事件。对这些重大历史变动，感受更深。而且记录与著述也是太史工作之一，因此他们感到有责任将这些亲历的历史变动记录下来。所以，司马谈临终对这个愿望仍念念不忘，嘱托司马迁他所欲论载的，亦即其个人所经历的汉武帝时代。其后司马迁继承其遗志，“悉论先人所次旧闻”，开始撰写《史记》，其与上大夫壶遂讨论其所欲撰写者，也集中在他所生存的汉武帝时代。

司马迁在撰写《史记》过程中，因遭遇“李陵之祸”，内心郁结，反映在他的著作之中，让后人认为司马迁在《史记》里对现实政

治“微文刺讥”，因而视《史记》为“谤书”。当然，司马迁在写作过程中，将其个人际遇的郁结，有意或无意融于《史记》中，也是非常可能的。至于“微文刺讥”，诽谤今上，即使他想这样做，在当时现实的政治环境下，却是不可能的。不过，《史记》虽非专为司马迁个人郁结而发，但司马迁撰写《史记》时，遭受现实政治的压抑，并且身受其摧残。如何超越现实的桎梏，在不触犯时讳的情况下，保留当代历史的记录，是司马迁颇费思量的问题，值得深入讨论。

司马迁所创造的纪传体，成为后世历史写作遵循的形式之一。《史记》是由一百六七十个主要人物编织而成，那里有帝王将相之辈，也有鸡鸣狗盗之徒，有慷慨悲歌的义士，也有穷途末路的英雄。这种历史写作形式让后人产生一种错觉，认为中国纪传体是以人为主。事实上，中国的纪传体本以叙事为主，和编年体一样，同样叙述历史事件发展的过程，以及演变的因果关系，所不同的，编年体是以年系事，纪传体则以人系事而已。司马迁以孔子的《春秋》为蓝图，创造中国史学的新形式。《史记》的结构分为本纪、表、书、世家、列传，形成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，即《太史公自序》所谓“二十八宿环北辰，三十辐共一毂，运行无穷”。本纪为历史发展演变的中心若北辰，年表以时间纵向贯穿，八书以时间横向相连形成一个轴心，世家、列传辐辏，形成一个向前运行的历史巨轮。从表面上看各部分自成体系，互不相关，但事实上各篇间却有无形的逻辑关联性。司马迁融合中国古史写作的形式，铸造成中国史学新的版型，并一直影响着中国两千年史学写作的形式。



言”，虽然这两处地方追求的目标一致，但表现的意义却不相同，进行的程序也有先后之别。前者是对孔子删《诗》《书》、定礼乐以来的学术发展与演变，作一次系统的整理。后者是将整理过的材料，纳入时间框限之中。二者综合起来，就是司马迁撰写《史记》的意旨，也是他对中国学术与史学的贡献所在。

汉武帝时开始的图书校整，规模较成帝时大。刘歆《七略》谓“孝武皇帝敕丞相公孙弘广开献书之路，百年之间，书积如山”。汉武帝时有计划大规模搜集轶书，并建立典藏制度，设置太史令管理与整理图书。图书典藏和整理是一体两面的工作，担任校书工作的是司马氏父子。司马谈为太史，整理石室金匱的图书，负责保管国家的文献与档案，就必须对相关资料进行整理校讎。章学诚根据《汉书·艺文志·诗赋略》收载“上所自造赋”，认为班固以刘向、歆校讎秘阁的工作成果为蓝本。而刘氏父子的工作成果则其来有自，源于汉武帝时所编的目录。这部目录很可能就是司马迁校书时的记录，但没有成书，后来司马迁撰《史记》时分散于书中各篇。其底稿或仍有流传，或藏于秘府，刘向、歆将这份底稿纳入己书，至班固时因循而成《汉书·艺文志》。

司马迁在《报任安书》自嘲“文史星历近乎卜祝之间”，“文史”所指就是文字处理，以及保管和整理图书档案工作。《太史公自序》记载司马谈“愍学者之不达其意而师悖，乃论六家之要指”，正是太史掌管图书工作具体的表现。司马谈在工作过程中，选择黄老作为主导思想，并提出《论六家要指》，是中国传统目录学最早的序录。司马谈壮志未酬身先死，司马迁继其遗志，接续校整图书，其目的就是为了研读和了解古籍。司马迁遂以公孙弘“明天人分际，通古今之义”为基础，向“欲以究天人之际，通古今之变”过渡，虽仅“义”与“变”一字之易，却创立了中国的传统史学。

战国以来，百家争鸣各显其说，学者不务综其终始，欲一观诸要

难。另一方面，先秦书籍经秦火焚销散乱，不仅引起司马氏父子的感叹，也为他们的工作带来实际困难。所以，司马谈在奉命整理图书时，似乎就立下心愿，对孔子校整《诗》、《书》、《礼》、《乐》以来的学术发展与演变，作一次系统的整理。孔子是保存先秦文献的第一人，先秦典籍经孔子删定，对上古学术发展作了第一次的集结后，自此之后中国文献始有可稽。至汉武帝时校书秘阁，司马氏父子对孔子以来的学术思想演变作系统的整理，是为第二次的集结校整。

汉初至汉武帝百余年间，在不同阶段因不同的政治需要，曾对不同类别的图籍作过初步整理，这些图籍最后都集中在司马氏父子处。他们就利用这个基础，完整而系统地整理这些图籍。所以，司马氏父子不仅是刘氏父子的先行者，并且为以后中国目录学开辟了新的道路。

就目录学的发展而论，《吕氏春秋·不二》对战国以来的“天下之豪士”，作扼要定调，目录学始见端倪，但对其学术流派却未作具体的划分。到《韩非子·显学》，才初见学术流派的传承。及至《淮南子·要略》提出纵横、刑名和法等学术流派的名称及其承继，仍然没有对战国时期学术流派的发展与流变，作整体的分析与讨论。淮南王刘安与司马谈同时，目录学发展至此，辨章学术流派的雏形已出现。中国学术思想经孔子第一次清理后，演变到这时已历五百年，迫切需要再一次的清理。于是，司马谈利用校整图书的机会，对国初以来驳杂的学术发展与流变，作一次彻底而系统化的整理。更在儒、墨之外，提出黄老之学。

司马氏父子首先提出对汉初政治发生重大影响的“黄老”，是当时学术的主流。曹参在汉初援黄老入政治，后来又继萧何为丞相，仍用黄老术。司马迁对曹参以黄老治国，予以很高的评价。《史记》对秦楚之际的黄老以迄盖公、曹参的承传关系，作了详细的叙述。司马氏父子认为，黄老之言出自齐之稷下。慎到、接子、田骈、环渊、尹文、宋钘同为司马迁所谓的稷下之士，他们的著作，在《汉书·艺文

志》中分别置于《诸子略》的道家、法家、名家、小说家等类中。虽然类别不同，但却同样是“其言黄老意”。司马迁将老子与韩非合传，并附申子，皆因其学皆源道德之意，亦即黄老之学。这些稷下学士，是战国诸子学说形成前，流行一时的学术思想流派。他们对后世包括道、法、名、阴阳等家思想都发生影响。所以，司马谈才会以黄老概括与统率阴阳、名、法、道德诸家的形成与发展。并在此基础上提出《论六家要指》，对战国以来的学术发展与流变，作系统化的整理与总结。并对经过系统化整理的学术流派，予以固定的分类名称，划清不同学术流派间的范围。这种分类后来为刘向、歆所继承，《汉书·艺文志》的《诸子略》即以此为蓝本形成。不仅班固《汉书·艺文志》的《六艺》与《诸子》由此而出，司马氏父子的工作更进一步支配了以后簿录之学的“经部”和“子部”的内容。这两个范畴划定后，史部之学随之逐渐萌芽。

司马谈任太史令近三十年，负责校整图书，并以在校整过程中搜集到的材料，准备撰写《史记》。司马谈卒后三年，司马迁接任太史令，继续司马谈未竟之业。太初三年，司马迁开始撰写《史记》，而司马氏父子校整图书的资料，则分散于书中有关章节中。刘向、歆未叙《七略》由来，但在此以前必有传授。若溯其来由，则诸子十家，可观者九流，实渊源于《论六家要指》，诸叙录则承司马迁著书诸人的列传而来。《史记》对著书诸人著述由来、承传所自、著述要旨，彼此之间的学术关系均有交代。后来，刘向、歆校书的叙录，一准于此。把这些资料汇集起来，就是《汉书·艺文志》中《诸子略》、《诗赋略》、《数术略》的资料来源与渊源所自。

司马氏父子生存的时代环境各异，司马谈生当黄老作为政治和学术思想主流的时代，所以确有“先黄老而后六经”的倾向。而司马迁除了继承其家学外，又曾问学于孔安国、董仲舒，加上汉武帝时，政治与学术发生空前的转变。为了迁就现实，司马迁的学术思想也作出